

冷战、南来文人与现代中国文学

——以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师资为讨论对象

金 进

内容提要 上世纪 50、60 年代，凌叔华、孟瑶、苏雪林等人先后南来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她们的任教、研究、交游和创作活动，一方面与其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写作姿态关系密切，同时也留下了冷战时期新马社会的宝贵历史图像。同时期从香港转道而来的韩素音等，以其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视角对南洋大学以及南洋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描写和思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迥异于台湾南来文人的图景。她们的态度、立场以及文学姿态中所蕴含的对中华文化遗产、国族集体记忆以及在地的人文高等教育的关心和聚焦上，为我们理解“冷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资产。

“二战”结束后，美、苏、英的同盟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在英国陷入战后经济危机的同时，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都试图控制世界。在 1947、1948 年左右，“冷战”这个词出现在乔治·奥维尔的政治谈话中，之后丘吉尔用了“铁幕”一词。从此之后，“冷战”就成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其中涉及到权力、政治影响和领土之间的局部战争。1947 年美苏在柏林城开始了军事对峙。1949 年 4 月，美、加、英、法、德、荷、比、挪威组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4 年 9 月，美、英、澳、纽、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组成了以对抗苏、中等“共产集团”国家为目的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新马一带，当马来亚共产党在全马武装暴动的时候，英殖民政府在 1948 年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这两个事件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跟“冷战”很自然地扯上了关系。相较于“冷战”，两大阵营之间在亚洲则爆发了一系列“热战”，如“韩战”、“越战”、美国介入菲律宾、泰国在老挝与越南的军事碰撞、缅甸（1948 年独立）境内的内战等。而马来亚地区所发生的紧急状态则似乎更像是“冷战”结构下的一种表现（至于 1963 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新加坡之间的对抗，那是这个地区自治之后发生的

事）。

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存在正好体现着“冷战”时代下，新加坡族群政治的对抗和分裂的过程。这种分裂不仅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分裂，也存在于华人族群之中，主要是英文教育背景和华文教育背景两种群体的冲突。南洋大学自 1953 年 1 月 16 日由新加坡树胶商人，时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的陈六使先生倡议举办，1956 年 3 月 15 日正式开学。从一开始，它就是马来亚政府，包括新加坡自治政府的眼中钉。政府从开始就认定南洋大学是一所培养和隐藏共产主义分子的地方。李光耀执政期间，始终怀疑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体都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他眼里“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跟他们打交道”。至于取消陈六使的公民权一事，李光耀坦承：“我们知道，陈六使这么做会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地。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①1968 年之

后的南洋大学进入了新加坡国家教育体系，慢慢变成一所与新加坡大学同质的英文大学，终在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部分，南洋大学由此走入历史。

一 南大中文系师资构成及与 南洋社会的互动

纵观南洋大学的师资组成（请参见附录一），我们会发现其中南来学者，特别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占绝大多数。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与新中国没有建交，台港和海外学者就成为了主要的招聘对象，而且这些学者到了南洋大学也会互相推荐，如苏雪林推荐凌叔华来南大^②，凌叔华之后小说家徐訏继任，这种互相推荐的同道之谊使得台湾学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加上当时南大中文系和台湾各大学中文系的设置相近，这使得台湾学者也乐于来南洋大学任教。李孝定^③曾这样描述：“南洋大学是一间新创办的大学。抵星后，不止一次听到当地各界人士和南大师生津津乐道，一九五五年创校之初，富商巨贾，贩夫走卒，慷慨输将，奔走呼号，万众一心，热烈感人的故事，在在流露中华文化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植根之深，涵泳之广。当地华人社会，对中国语言文学系，尤其是爱护有加，寄望殷切。历任系主任，都是新加坡政府从台湾高等教育界遴聘担任；所订课程表，和台湾各大学中文系，如出一辙，除了将‘国文’一辞，改为‘华人’外，几乎连小异都不存在，只要看系的全名，和课程表的结构，任何一位中文系科班出身的人士，一眼便能看出，是从传统中国中文系全盘移植过去的。”^④

另一方面，相较于台港两地，南洋大学的薪资还是很丰厚的。很多学者南来目的最明显表现在为赚取多一些薪资。苏雪林曾言台湾生活费用之高，而当时看到“汪家平日饮膳甚丰，又常请客，台湾生活昂贵，我们教书匠即尽以月俸供伙食，尚虞不给，不知汪家常请客，钱从何来？”^⑤再如“闻继本校王德昭、钟盛标两家之后，李辰冬于星期一家外出回来，房门大开，箱篋皆启，李太太数代珍饰及辰冬半辈子积蓄均被席卷而去，闻之大为惊愕。李以不得意于台湾，远来南洋，以为可以安居乐业数年，赚笔钱为养老计，不意

竟将半年辛苦所积，来此送礼。今日世界，何处为安全之乡耶？”^⑥这些都道出苏雪林经济上的困难，值得注意的是苏雪林的南大薪资大多数资助了中国大陆的亲人，还曾被台湾当局问话，这也足见“冷战”环境下的政治无所不在。苏雪林曾说：“南大既给我一年聘约，成大又准假半年，我遂心安理得住下来。我的意思因觉星洲一切生活比台湾好，一半目的也为了钱。我是一个淡于名利的人，生平甚恶言金钱二字，因我素来生活简朴并不多需阿堵物。不过我虽不需，别人却需，而且事关生死存亡，安能坐视不救？”接着她讲述了众多侄儿侄女在大陆的遭遇，诚心想帮帮他们：“我还有几个侄辈，以前借祖产尚可温饱，共党一来，祖产和栖身之地都被没收了。都变成一寒彻骨的人了，我也只好量力扶一把。南洋大学教授的薪资高过台湾的数倍，我想做满这一年，把用不完的钱积蓄起来作为救济大陆亲属的基金，后果如愿。我那笔基金初由香港四妹转，后由侨美侄媳转，每年须费五、六百美金，我补充了好几次，至今未替，虽是涓滴之助，对那边亲属果稍有裨益。”^⑦

还有一个原因跟首任校长林语堂有关，当年他从台湾请来了学者，后来虽然其中很多人随着他与陈六使闹翻而离开，但也无形中为从台湾招聘学者开了个头。皮述民就是一例：“皮老师是于一九六六年起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当时南大副校长到台湾招聘教员，皮老师就和一批教员应聘到新。”^⑧皮述民本人后来又有一段补述：“廿五年前，我带着妻子和刚出世的孩子，从台湾受邀到本地的南洋大学来执教。当时已考获硕士学位，在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也教了六年书。”^⑨

1949年后海峡两岸国共分治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在根本上决定了1950年代两岸文学的总体风貌既有差异又有诸多深层相似性的特征，这种相似性主要表现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紧张性，导致了国共两党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都致力于将文学当作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这个时期的台湾文坛主要由大陆迁台的作家组成，他们都是带着国民党政治背景或者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包括张道藩、王平陵、陈纪滢、王蓝、纪弦、雷震、梁实秋、李曼瑰、夏济安等人。南洋大学的师资绝大多数都来自台湾，

仅以中文系为例，我们会发现这些教师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年纪偏大，多是从中国大陆离散到台湾，多有大陆的生活经历（包括学习经历），而且他们与国民党文艺界颇有关系，如凌叔华（陈西滢之妻）、孟瑶（与梁实秋等人交好）、苏雪林（以反鲁、反共著称），更有像涂公遂这种后来被发现是国民党员的文人。第二，从政治立场来说，他们有着或多或少的反共思想，更偏向国民党政权，对中共政权颇有敌意。不过因刚经历国共内战和大陆“易帜”等时代巨变，同时又在左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新加坡，所以他们极少在公开场合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立场。^⑩下面我选择曾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过的凌叔华^⑪、苏雪林^⑫、韩素音^⑬和孟瑶^⑭为主要对象，同时参考其他教师的言论，如担任系主任14年之久的李孝定，试图寻找南洋大学中文系教师应对南洋大学各时期所面对的时代风云的方式；也试图从他们的作品中，梳理这些南来文人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关心，以及各有个性，同时又有着“冷战”思维的一些精神特质。

首先是他们对南洋大学左翼学生运动及新加坡左派政党的态度。南洋大学学生参与马共等左翼势力的活动情况已有专文研究，此不赘述。^⑮李光耀后来也回忆到曾经遇到的学生抗争运动：“1966年10月1日，我重申新加坡四大语言都是官方语言，地位平等。……五天后，我召集四个商会的全体委员，在电视摄像机前毫不含糊地告诉华族代表们，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华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他们争取提升华语地位的种种努力，至此终告结束。尽管如此，华文学府南洋大学和义安学院的学生依旧跟我们作对。1966年10月，200多名学生趁我为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一个图书馆主持开幕仪式时示威。过了几天，义安学院的学生在我的办公室外面示威，跟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在校园里静坐抗议。在我把参与两次示威活动的马来西亚籍学生领袖递解出境后，学生的骚乱便逐渐平息。”^⑯

在这些南来文人的笔下，左翼学生的形象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狂妄的无理形象。时任中文系主任李孝定这样回忆：“我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到南大履新，到翌年年底，是南大学潮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一连三次大学潮，后来新加坡采取了霹

雳手段，警察开了镇暴车，半夜包围学生宿舍，逮捕滋事学生，据说宿舍里面，几乎十室九空。中文系学生，三次被开除的近两百人，确数我是记不得了。一年多的时间不算短，事情的发展，也是错综复杂、连绵不绝的。”^⑰李孝定的回忆中，南大学生会是非常有政治功利性的，一次李孝定在中文系学生会作完报告后，“我说完不久，作记录的同学，将会议纪录整理好，送请我签字，我当然一个字一个字的仔细看，这是我在台大校长室八年秘书的功力，同学们是望尘莫及的。我发现凡我批评政府的话，他一字不漏的全记下来了，关键所在，又加强了语气，足见这些学生也非弱者，是训练有素的；重要的是，我批评同学不对的话，却一切从简，或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我一一指出，要求他重新整理，我再签字。他们大概也感到我这顾问也并非易与，一时沉默了下来，气氛显得很尴尬。这时，我又开始讲话了，大意是受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在求知，也要学做人，像这种会议纪录的写法，就显得很不诚实。”^⑱另一次是跟学生会干部李万千的接触。“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外面是书记陈三妹女士的办公室，中文系有三位女同学谢月馨、戴纯如、黄南玫在那儿洽公，不久，我听到三位女同学和人辩论的声音，是男声，听不很清楚，似乎是政治性问题。他们的声音，先都还平和，渐渐地，男声高了起来，女声越来越低，我听得有点不耐了，走出去一看，竟然是那位风云人物正意气风发、眉飞色舞的高谈阔论，我平和地说：‘这位同学，请你出去。’他当然被激怒了，心里一定在想：‘你算老几，李总理我也敢和他拍台子。’他说：‘李教授是否要干涉我的言论自由？’我淡淡的说：‘我管不着你说什么，但这儿是我的办公室，你知不知道妨碍了我的公务？’我指着门说：‘请出去。’他才悻悻地走了。”^⑲苏雪林赴新之前，对新加坡的不稳定社会还是蛮担忧的，如“看报，见新加坡马华冲突死十九人、伤四百余人、逮捕千余人、华人汽车被毁百余辆，殊为可骇。”^⑳“老蔡送来南大临时主席刘孔贵信，附来致英领馆一函，嘱余去办手续，启行赴校，盖南大为改组纠纷上课延期，八月底到尚赶得及也，余不由大起恐慌。”^㉑第二种南洋大学学生的形象是青春热血，但又有着政治上不成熟的稚气，如韩素音笔下的左派学生

的抵抗运动。“1960年夏我身体垮了。2月，我去了柬埔寨，开始写一本新书《四张面孔》。……我和南洋大学左派学生联合会展开了一场激烈、长时间的争论。据说马来亚共产党渗透进了这个组织。引起争论的原因是我公开支持李光耀总理在南洋大学的讲演，激起了左派分子的愤怒，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十分粗鲁的信反对我。我一度遭到排斥，后来有108名学生集会支持我，最后我在家里会见了学生代表，取得了和解。这增强了我作为无党派人士的地位，但却引起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我的愤怒。”^②同时，韩素音也谈到南洋大学学生的抗争精神：“（1963年）接着就轮到南洋大学遭难了。警察在夜间袭击，117名学生被包围，所有大学的刊物被禁止。除了那些从警察那里领到特许证的人，其他人一律不准进入南洋大学。1963年期间，我帮助几个学生悄悄离开绿色的新加坡。这些学生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因为向被禁的刊物投稿而受牵连的人。我再也没有走进过南洋大学。”^③这些都为我们了解50、60年代新加坡左翼学生运动的情况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材料。

第二点就是对新加坡政府打压华文教育的政治形势的关心和反应。新加坡执政者从现实利益出发，在建国之初，为了华、巫、印三个种族的平等，在英校中引进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同时在华文、马来人、淡米尔学校，引入英文教学，后来英校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蚕食华文的政策，华人社团、华人报章和学生团体都有反对行动，如中华总商会的康振福、《南洋商报》总经理李茂成、高级社论委员李星可，都曾被政府警告和抓捕。而被视为中华文化堡垒的南洋大学，因为其华人社会资助的背景，它的立场也变得“左倾”起来。“南大毕业生是另一股反对势力。他们在1972和1976年两届大选中都提出华族语言和文化的课题。当我尝试把南大的教学语言从华语改为英语时，南大学生会会长何元泰唆使同学不要使用英文而改以华文在考卷上作答，结果被校方革除了会长的职位。毕业后，他以工人党的身份参加1976年大选，指责政府扼杀华文教育，号召讲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反对政府，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文化。他知道我们不会在竞选期间对他采取行动。结果他只获得31%选票，一落败就逃

往伦敦。”^④这些都看到新加坡在“冷战”背景下，以及现实的族群关系冲突下，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打压态度。这一点身为南大中文系主任的李孝定是亲历者，他得到学校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消息后感到“错愕”，“我去看黄校长，请问作此改变的理由，他说主要是想提高学生英国文的能力，我说我非常不赞成这种作法，这并非因为我不能用英语教学，而是想要借此加强学生英国语文的能力，那显然是南辕北辙；我又举《孟子》缘木求鱼的比喻，说这种改变，不但不能提高学生英国语文能力，而且必然大大的降低中文系的学术水准。出乎意外的，我的意见居然被采纳了，校方宣布：中文系、历史系的中国历史课程维持现状，其他课程和其他院系，通通改采英语为教学媒介语。……我相信其他各院系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政府当局和黄校长一定也认同我的意见，不然我的看法是不会被接受的；但为什么仍然要做此宣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外，我实在想不出有其他的理由。”^⑤

相对于李孝定的中肯态度，苏雪林似乎总是要将南洋大学的学运与中国大陆的学生运动作很多不必要的勾联，意识形态之争似乎在她的回忆中萦绕不去。她对南大学生运动的态度是不闻不问，其日记中有着很多关于校园内学生运动的记载，如“晚间八、九时，闻楼前马达声怒吼不绝，窥之则红色高层及黑色警车数辆停楼前，其中皆武装军警，又闻学生楼学生高声呼喊不止，知开除学生不肯离校，军警来拘捕，不然则押解登程也。余所阅学潮多矣，此次南大学潮则颇足令我同情，看来学潮尚须扩大，数星期内将无课可上，余对南大兴致亦复索然”^⑥。而对南洋大学被政府收编的危机，她也漠不关心，“今晨看报，见南洋商报社论有关南洋大学之议论，谓新课程实施后，南大程度将提高，可与世界任何大学媲美，但南大亦将失其中文大学特色，转而与新大、马大相等。余近来对南大已毫无趣味，希望明年改制后，不续聘我，送我旅费返台，即续聘，余亦不愿留矣。”^⑦在她的日记中，类似“今日阅报，匪区爆炸一颗原子弹，又闻苏俄赫鲁雪夫下台，乃毛氏所逼迫者云”^⑧，“今日看报毕，总商会组织贸易考察团下月赴中国访问，李光耀忽对美国数年前情报人员活动，及行贿事加以揭露，又说廿四小时可

命英国基地军队撤退，其意当为何，难以捉摸，看来当是投向共产怀抱之先兆，看来余在此不能久矣”^⑧，这样的记载颇多，可见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右倾姿态。

二 师者的传道授业与文学创作活动

作为大学教师，南来作家的文化活动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这些作家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新马两地的文学活动。苏雪林、孟瑶两人曾经从新加坡到槟城，中经吉隆坡、怡保、太平等地，旅途中都由新马文友接待。苏雪林在马华文坛早就有了文名，当时马来西亚怡保“有个朱昌云君性爱文艺，办了一种华文刊物，凡台湾传到南洋刊物其上有我文字者，必尽量转载。他曾寄他办的那种刊物到台南，并与我通信。我抵星洲后，又有一位黄崖先生本与先到南大的孟瑶相识，偕同孟瑶来访我，说他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名叫《蕉风》，约我投稿，又说他领导若干学校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文艺讲习会想邀我和孟瑶去讲演一次，我与黄君谈了一会，知道他思想纯正，并不是盲目跟着时代潮流跑的人，对他遂颇为契重”。^⑨1964年12月18日跟孟瑶一起从新加坡出发，19日上午8点到吉隆坡，黄崖驾车来接，并带着他们游遍吉隆坡。之后，苏雪林和孟瑶于20日到怡保，游三宝洞，中午与朱昌云等八位怡保名流共进午餐，之后赴太平游湖并夜宿。21日上午十时抵达槟城，休息于金沙酒店。22日两人有两场公开演讲，孟瑶讲自己的写作经验，苏雪林讲《从屈赋中看中国文化的来源》，听众多为中学生，“他们非常好学，把我讲稿借去连夜抄写，居然都抄成。这种精神，大陆及台湾的学生尚有所不及”。23日当地侨领温先生开车带她们游览槟城，景点包括极乐寺、升旗山，夜宿槟山酒店。24日下午与赵尔谦相会，之后黄崖作东，请苏雪林、孟瑶和赵尔谦吃晚餐。晚上渡海，坐晚上八点的火车返回新加坡。“计十二月十八日出门，二十七日回家，在外约九天。”^⑩之后苏雪林与马来亚文人有些来往，主要是与黄崖的交往，如：“到图取信无所得，仅得黄崖寄回演讲稿一件，知黄已返吉隆坡矣。许云樵先生送书三本，一曰马来亚丛谈、曰马来亚地理、曰南洋文献录长编，余下午写信致黄崖，又写信与

许先生，拟赠以崑谜、天马集各一，看丛谈毕。”^⑪

培养新马本地作家和学者也是这些南来文人的贡献，他们也努力帮助南洋学生的成长和传播中国文化。新加坡本土作家连士升就盛赞南洋大学聘请到凌叔华，“记得一九二七年的新秋，我从崇山峻岭的故乡抵达古色古香的北京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说，母校已经出了两位女文豪：一位是冰心女士，另一位就是凌叔华女士。……老实说，创办不久的南洋大学能够请到叔华那样素养深、能力强、气魄大的作家来指导一般聪明的学生，这倒是南大的福音”。^⑫凌叔华曾回忆：“一九五六年夏，我来南大执教《新文学研究》及《新文学导读》，发现这里青年学子爱好新文艺而且有写作天才的很不少。我调查他们看过什么书，确是出奇的少。但是他们偶然看到一本新书，便大家抢着买。前年我去港度假，为大学带回数百册新书，不到一周，抢借一光。听说如有关于新文艺理论之作，如《文学研究》、《文学专刊》及《文学遗产》之类，在市上发现了，常常会加二三倍价钱被捷足先登者搜去。有一次我发现自己多了一本《文学遗产》，给了一个学生，他高兴得流出眼泪来！”^⑬而韩素音更是与南大文艺青年交情匪浅，“在南洋大学，大批业余画家出现了。我及时举办画展，展览他们的作品，为他们写序言，为出版的书签名，……我买画，与其说为艺术，还不如说是为了帮助那些热切的画家。（他们多数很年轻，有一些人很穷困。）我努力发掘马来亚华人文学，取得了一些成效。南洋大学的学生来到我的门诊室，给我看他们写的短篇故事、诗歌，向我吐露准备写大部头小说的想法，有时也来向我借钱。尽管他们的处境艰难，多数能认真按时还钱。一种以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短篇故事、剧本、诗歌表现民族意识的觉醒出现了。由我作序的一本马来亚中国短篇故事出版了”。^⑭

另一方面，像苏雪林、孟瑶这类作家，她们在新加坡期间，精力倒是集中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如苏雪林的楚辞、诗经、孟子研究，孟瑶的中国戏曲史、小说史、文学史研究，很多后来结集的专著都是完成于南洋大学执教任期内。^⑮辜美高先生就谈到这一点：“扬宗珍老师开新文学概论（一年级）、中国小说（二年级）、中国戏曲（三年级）三门课，后两科她后来把讲义扩充成书，由

台湾某书局出版,我们的笔记便显得不重要了,所以没有保存下来。记得苏雪林老师开诗经、楚辞两门课,前此她在成功大学讲学,有些课堂讲义用该校用过的讲义,请工读生重抄,后来她也把讲义整理成书,在台湾出版,我们的讲义也就没有什么用处。”^⑧余大纲在给孟瑶《中国戏曲史》的序言中这样说:“两年前,孟瑶应南洋大学的邀请,去新加坡任教,我和梁实秋先生,不约而同的,劝她在讲学和写作之余,整理一下中国戏剧史。……孟瑶确能不负我们的期望,在两年之中,完成了这部长达四十万字的中国戏曲史。”^⑨苏雪林也这样说过:“我从五十四年开始,要求学校开楚辞一课,以便教学相长。学校应许了。我于《诗经》、《孟子》外,又增加三小时的功课,虽然劳碌了些,我倒乐意,因可在海外宣扬我这人人听了摇头特别奇怪的屈赋研究。”^⑩可见,南洋大学对于这些台湾学者来说,也是一个整理学术思路和著书之处。

更值得一提的是南来文人在旅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如苏雪林虽集中精力在屈赋和诗经的研究,但也留下了四首题为《狮城岁暮感怀》的律诗;另外中文系的老师多有诗作,这些诗作多收集在《云南园吟唱集》(南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1960年版)中。其中以凌叔华的散文、韩素音的长篇小说创作为其中杰出者。

凌叔华所著的《爱山庐梦影》共十一篇散文,她自言:“这本薄薄小书是我在南洋后收集的一件纪念品。这里面描写了我近三四年的生活与思想——当然也充溢着我对云南园流恋的情绪。最使我欣幸的是在短短三四年中,我不但得以重温我‘爱山’的旧梦,同时还遇到几位对人生对文艺工作有同样见识的真朋友。……因为几个我敬佩的同道的鼓励与劝说,我觉得出一本散文集作为来星马的纪念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⑪文集开篇即是《爱山庐梦影》(1958年),写的是自己爱山情结的来由,接着从新加坡南洋大学的云南园,重点回忆北京的西山、广东老家的无名山、武汉的珞珈山、新加坡的裕廊山,将在故国的人生经历贯穿其中,抒故国幽思之情,是一篇声情并茂的力作。开头和末尾部分前后呼应,写出了作家离散到南洋后虽孤独一人,但怡然自得的心境:

“不识年来梦,如何只近山。”一次无意

中听到石涛这两句诗,久久未能去怀,大约也因为这正是我心中常想到的诗句,又似乎是大自然给我的一个启示。近来我常在雨后、日出或黄昏前后,默默的对着山坐,什么“晦明风雨”的变化,已经不是我要看的了。我对着山的心情,很像对着一个知己的朋友一样,用不着说话,也用不着察言观色,我已感到很满足了;况且一片青翠,如梦一般浮现在眼前,更会使人神怡意远了。不知这种意境算得参“画禅”不!在这对山的顷刻间,我只觉得用不着想,亦用不着看,一切都超乎形态语言之外,在静默中人与自然不分,像一方莹洁白玉,像一首诗。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爱山;也不知是何因缘,在我生命中,凡我住过的地方,几乎都有山。有一次旅行下客棧,忽然发现看不见,心中便忽忽如有所失,出来进去,没有劲儿,似乎不该来一样。(《爱山庐梦影》,第1页)

寓前阶畔新的栀子花,早上开了两朵,它的芬芳,令人想念江南。坡上的相思花开,尤其令我忆念祖国的桂花飘香,若不是对山的山光岚影依依相伴,我会掉在梦之谷里,醒不过来。

这时山下的鸟声忽起,它们忽远忽近的呼唤着,这清脆熟悉的声音,使我记起五个月前在伦敦的一夜,在我半醒半梦中,分明听见的一样。

这些鸟声,是山喜鹊鸚鵡和唤雨的鸠,飞天的云雀吧,除了在梦中,严寒的伦敦,它们是不会飞去。

想到这一点,我更觉得对面的山谷对我的多情了。(《爱山庐梦影》,第9页)

相较起凌叔华的轻松飘逸的散文,韩素音的长篇小说《餐风饮露》^⑫可称作是一部来自西方左派知识分子视角的作品。最早关于这本书的介绍是韩素音的回忆录,她说:“通过阿梅及所有其他佣人,通过自己在马来亚的旅行和到‘新村’去治病人,我开始认识马来亚。我把自己看到的都写了下来。我的书带着丛林和沼泽地的气味,也带着人体切片的气味,有瓦砾,有荒芜。该书于1956年出版,我给它起名为《……雨,我饮的水》。这本书至今还在重印,在美国一些大学里仍

然被列为关于马来亚，关于紧急法情况最好的书。”^⑧小说中对南洋华人生存状况的刻画，让我们了解和认识到新马社会的不公平的一面。如英文版第七章中，当“我”向马共嫌疑犯阿梅建议，让她谈到有人盗取清明节祭品，并在给政府报告中指出每个人要尊重别的民族的习俗的时候，阿梅回答说：“我没有记录下那个人所说的，因为我想审判的结果不会因为我写什么而改变。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她。在这里，警察是马来人，军队是英国人，他们惩治和对付我们华人。时下是没有公平可言的，韩医生。”而我也认识到：“突如其来的恶心抓住了我，因为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马来亚当下残酷和愚蠢的日子就这样频繁发生。……无知的糊涂的，仅仅只是基于种族的怀疑，就运用紧急法令来先行逮捕，不经审判，也无需证据，不需要所谓的合理怀疑。就可以扣留任何人最少两年。”^⑨在这两段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出身马共的阿梅对南洋社会中各种族之间的不平等状态的理解。另外，对阶级的刻画也是韩素音书写的内容：“陆克四周围看了看，忽然觉得这个宴会场面变了样：它已经不是普通华人社会欢迎新到任的警察首长的宴会，像他们欢迎任何其他新到任的英国政府官员一样；它已经不是那种习见的英国式的予取予求，比日本人的赋课来得那么顺利圆润的取求方式；而是代表法律与秩序，财富与产业的整齐队伍，在展示着它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与相互依赖，企业东主及其保镖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在酬谢那些来保护他们的穿着制服的白种警务人员。”^⑩另外，小说中对马共的同情、对马来亚国民性的批判、对殖民者腐败的描写，都彰显着她左翼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

三 结语

冷战时期的50、60年代，新马两地左翼政治势力强大。在马来西亚，马共采取的是武装斗争的形式争取民族解放；在新加坡他们采取的是华校学生运动（包括南洋大学）争取选票，以图在议会政治中取胜。新加坡左翼激进势力与以李光耀为首的务实派政府之间的斗争，一直伴随着南洋大学诞生和成长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来文人先后来这个命运多舛的华校，或从自由

主义，或从共产主义，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身边发生的政治事件或多或少地都有所表态，这些表态也体现着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心态。

南来文人返台后大多很少提到新加坡，即使提到也大多没有多少赞语。仍有交往的如李孝定、凌叔华等人，如：“今日南洋商报送到，共十六大张，李辰冬、巴壶天、王德昭、葛连祥、钱歌川，甚至远在英伦之凌叔华亦有文字。”^⑪对南洋大学不客气的也有，如苏雪林。苏雪林返台后，提到南大不多，一次是在抱怨托运行李太慢，言“上午赴校上文学史一堂，讲得比昨日稍佳，行李连提单也未寄到，不知何日始到台湾？余之笔记均在行李中，若南大不害人，余早作归计，则当询赵海金授课至何处，而将一部分笔记由飞机带来矣”^⑫。一次是记载到“今日赴中心望弥撒，将南洋旅居年半记交去”^⑬。最后一次是：“今日，老蔡交王遇春、凌叔华信。王云：南大此次不续聘，又自动辞职者共廿八人。中文系不聘者，为蔡寰青、黄书平、葛连祥、王德昭，赴香港新亚；贺忠儒、杨光德，均于月内返台。南大本年二月间发给教职员聘约，均为半载，此次则自八月一日起至明年四月止，共为八个月，如此对待教职员，诚打破世界纪录。”^⑭究其原因，可能是新加坡政治给他们的观感不好，特别是左翼社会运动、南洋大学的左翼倾向，都让奉行自由主义的他们有着极大的不适感。

无论如何，在年近（过）花甲之年，凌叔华、韩素音、孟瑶、苏雪林等人的南来还是为新马两地带来了五四文学的新气象，鼓舞和激励了南洋本地的青年作家，也通过南洋大学中文系这个平台，传道授业，培养了在地的知识分子精英，这对于文化相对落后的新马地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贡献。历届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中（请参见附录二），后来活跃在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有卢绍昌、吴天才、丘柳漫（1959年毕业）；龚道运（1960年毕业）；黄孟文、陈荣照、苏新鋈、叶钟铃、王慷鼎（1961年毕业）；杨松年、区如柏（1963年毕业）；周清海、辜美高、陈清德（1967年毕业）；云惟利（1969年毕业）；林纬毅、欧清池（1971年毕业）；谭幼今、周维介、蔡慧琨、林万菁（1973年毕业）；王介英（1974年毕业生）；杜南发、姚梦桐（1976年毕业）等。这其中还不包括

其他科系受他们影响的学生,如梁明广(1959年毕业于现代语言系)、崔贵强(1959年毕业于历史系)、颜清滢(1960年毕业于历史系)、杨进发(1961年毕业于历史系)、李业霖、廖建裕(1962年毕业于历史系)、饶尚东(1962年毕业于地理

系)、陈瑞献(1968年毕业于现代语言文学系)、李元瑾、柯木林(1971年毕业于历史系)等各个时代的南大学生。^⑨只要稍微对新加坡社会和文艺界有些了解,便可知这些南下文人的弟子在新马两地的文化建设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附录一:台港学者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大概情况

姓名	任职时间	职称	所授课程	其他事项
余雪曼	1956—1961	教授兼系主任	中国文学史、楚辞	
凌叔华	1956—1959	教授	中文语法、中国新文学	
潘重规	1956—1959	教授	文字学	
贺师俊	1956—1959	副教授	中国通史	
王詠祥	1956—1959	讲师	国学导论、大一国文	
罗慕华	1956—1960	讲师		
闵守恒	1957—1959	副教授	汉学导论	
刘太希	1957—1961	副教授	中国诗词	
黄念容	1957—1959	讲师	大一国文	
涂公遂	1958—1960	教授兼系主任	中国哲学史	
嵇哲	1959—1960	讲师	中国诗词	
韩素音	1959—1961	兼任讲师	现代亚洲文学史	
邹达	1959—1960	助教		
祁怀美	1959—1960	助教		
史次耘	1959—1960	教授		
黄勛吾	1960—1974	副教授、教授	中国文学史、词曲、唐宋文选、词选、专书选读(三):楚辞、中国文学专题研究:东坡词	
郑衍通 (原名郑亦同)	1960—1971	讲师,62年开始兼图书馆主任	文学名著、中国经学专题研究:易经、中国散文选读	
曹树铭	1960—1963	讲师	应用文	
李星可	1960—1961	兼任讲师	语言学	后去了澳洲
张瘦石	1960—1965	兼任讲师,61年开始任副教授,曾任系主任	文学概论、语法、中学中文教材教法、应用文	原为新加坡中正中学教师
徐訏	1961—1962	教授	中国小说史	
高鸿晋	1961—1963, 逝世于南洋	教授	文字学、钟鼎文、诗经、甲骨文	来自台湾师范大学
钟介民	1961—1963	副教授	伦理学概论、荀子、中文、中国哲学史	
朱兆祥	1961—1965	副教授	语言学概论、华语发音学、声韵学、中文	

续表

姓名	任职时间	职称	所授课程	其他事项
傅隶朴	1962—1965	教授	中国文学批评、修辞学、中文、专书选读（二）：左传、中国哲学史	
扬宗珍 (孟瑶)	1962—1965	副教授	新文学、小说、戏曲、中文	因夫妻感情问题来南洋。
葛连祥	1962—1966	讲师	诗、中文、专书选读（五）：庄子、韩非子	
黄六平 (向夏)	1963—1966	讲师	训诂学、中文，语法	
蔡寰青	1963—1966 年 9 月 1 日离职	讲师	中文	
刘延陵	1963—1964	兼任讲师		
陈铁凡	1964—1965	教授	文学名著	
李孝定	1964—1978 年 任满离校	教授兼系主任	文字学、四部概要、古文字学	
苏雪林	1964—1966	教授	专书选读（一）：孟子、专书选读（三）：诗经、楚辞	
皮述民	1966—1992	高级讲师、副教授	中国诗歌、中国文学批评、诗选、中国戏剧、红楼梦、宋词、中国古典小说	后返台，任教于文化大学
杨承祖	1966—1970	副教授	专书选读（二）：史记、专书选读（三）：诗经、中国散文选读	后返台，任教于东海大学
胡楚生	1966—1976	讲师	训诂学、修辞学、中华历代文选、专书选读（二）：史记	南洋大学博士，后返台，任教于中兴大学
蔡秀珍	1968—1976	讲师、副教授	现代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二）：汉书、中国小说、马华文学	
谢云飞	1967—1976	高级讲师、副教授	声韵学、专书选读（五）：韩非子、中国声韵学、广韵研究	后返台，任教于政治大学
赖炎元	1967—1982	高级讲师、副教授	荀子、专书选读（一）：论语及孟子、中国校勘学、中国经学专题研究：礼记、说文研究	
王忠林	1969—1976	高级讲师、副教授	专书选读（四）：荀子、曲选、中国经学专题研究：左传、专书选读（三）：诗经、雅学研究	后返台，任教于高雄师范大学
周天健	1971—1972	讲师	中国诗歌及习作、中国历代文选及习作、专家诗研究	
钱歌川	1971—1974	助理教授	翻译	

续表

姓名	任职时间	职称	所授课程	其他事项
王叔珉	1972—1981	讲座教授, 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后的国大中文系首任系主任	庄子、训诂	
应裕康	1975—1981	讲师		后返台, 任教于高雄师范大学

附录二: 南洋大学所培养的学生 (担任南洋大学中文系教职的)

姓名	任教时间	职称	所授课程	学历
龚道运 (本科)	1965—1994	讲师、副教授	中文、荀子、专书选读 (一): 论语及孟子、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中国近代与现代思想文选	1961 年南洋大学文学士学位, 1963 年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学位 (第一级), 1977 年新加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苏新鏊 (本科)	1965—2000	助教、讲师、副教授	中国哲学史、专书选读 (四): 庄子、中国哲学专题研究: 先秦心性思想研究、论语与孟子、现代儒学	马来西亚人。1961 年南洋大学文学士学位, 1967 年香港大学硕士学位, 1977 年南洋大学博士学位
卢绍昌 (本科)	1963—1971、8、2 出国研究	助教、讲师	中华历代文选及习作、语言学概论	
林源河 (硕士)	1963—1966	助教		后任新加坡文化部长
尹瑞霞 (本科)	1965—1966	助教		赴香港大学读硕士, 未读完, 嫁到马来西亚
罗先荣 (本科)	1963—1965	助教		后任图书馆副馆长
翁世华 (本科)	1963—1993	助教、讲师、助理教授	专书选读 (三): 楚辞、高级华语、金文研究、文字学、翻译、训诂学	1959 年南洋大学文学士学位, 1967 年英国德兰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75 年南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陈海兰 (本科)	1971—1994	讲师	中国散文选读、中国小说、中国现代文学	1963 年南洋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 1970 年台大中文研究所文学硕士学位
杨松年 (本科)	1971—2001	讲师、副教授	中国文学批评、新马华文现代文学、中国韵文选读	1963 年南洋大学文学士学位, 1970 年香港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74 年香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 ①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第454、247、382—383页，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版。
- ②1952年苏雪林曾赴英国，当时凌叔华陪同她游剑桥大学。
- ③李孝定（1918—1997），又名陆琦，湖南常德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台湾大学校长室秘书，并任教于台湾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私立东海大学等校。为海内外所认可的中国文字学专家，著有《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附录集释》、《读说文记》、《汉字起源与演变论丛》等。
- ④⑦⑧⑨李孝定：《逝者如斯》，第106页，第119—120页，第124—125页，第127页，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下同。
- ⑤苏雪林：《民国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十月十七日（星期一）》，《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五册》，第139页，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印行，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编1999年版，下同。
- ⑥苏雪林：《民国五十四年（一九六五）七月廿九日（星期四）》，《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第398页，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印行，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编1999年版，下同。
- ⑦苏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第225—226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下同。
- ⑧《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第十届毕业班纪念特刊（89—90）》，第148页，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90年版。
- ⑨黄家红：《轻舟已过——与皮述民老师的一席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第十二届毕业班纪念特刊（91—92）》，第49页，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92年版。
- ⑩从我对上过他们课的南大学生（如陈荣照、辜美高、李志贤等人）采访来看，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南来文人在课堂、私下都不谈政治，而且国民党、共产党都不谈。政治方面谈得更多的也只有苏雪林，不过她的政治观点多放在自己的日记中抒发，在南大的公开场合，她也没有跟学生谈论过。
- ⑪凌叔华（1900—1990），本名凌瑞唐，祖籍广东番禺，1907年从缪素筠、王竹林、郝漱玉学画，同时跟辜鸿铭学英语和古典诗词。1919年入天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1921年入燕京大学外文系，1924年毕业，与周作人、胡适、徐志摩、陈西滢、丁西林交好。1926年与陈西滢结婚。1928年随夫去武汉大学，1931年受聘。1947年随夫去英国，定居伦敦。1956年到1960年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
- ⑫苏雪林（1897—1999），本名苏小梅，字雪林，祖籍安徽太平，1919年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1921年留学法国，1925年返回中国，开始文学创作。历任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教授，与凌叔华、袁昌英合称珞珈三女杰。1936年开始“反鲁”。1944年转而研究屈原，后赴台湾。1952年起，在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任教，1973年退休。1964—1966年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
- ⑬韩素音（1916—2012），本名周光瑚，生于河南信阳，中欧混血女作家，1933年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5年比利布布鲁塞尔大学学医，1938年回国。1944年获伦敦大学医学学位，194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52年南下马来亚，居住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行医于新马两地，并在1960—1963年间任教于南洋大学中文系。
- ⑭扬宗珍（1919—2000），笔名孟瑶，湖北汉口人。1942年中央大学历史学系毕业。1949年赴台，执教于台湾省立台中师范学校，1952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共计七十多部，长篇代表作有《心园》、《黎明前》、《屋顶下》、《斜晖》、《乱离人》、《杜鹃声里》、《浮云白日》、《太阳下》、《李生的故事》、《这一代》、《两个十年》等，其中《太阳下》创作于她执教南洋大学期间。另有《中国小说史》、《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三史行于世。前面两部陆续出版于1964—1966年，正值她任教于南洋大学期间。
- ⑮新加坡左翼学生运动以及马共活动的相关问题可参考：余柱业：《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Petaling Jaya, Selangor：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年版、方状壁：《马共全权代表方壮壁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咨询研究中心2006年版、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版。
- ⑯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第171—172页。
- ⑰苏雪林：《民国五十三年（一九六四）七月廿六日（星期日）》，《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第232页。
- ⑱苏雪林：《民国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八月三日（星期一）》，《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第235页。
- ⑳㉑㉒㉓韩素音著，陈德彰、林克美译：《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第331页，第173页，第271—272页，第86—87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
- ㉔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第173页。
- ㉕李孝定：《逝者如斯》，第149页。值得一提的是，李孝定对当时新马政局的理解和认知是非常深刻的，像“新加坡的独立，据判断应是马来西亚政府的主意，原因当然是为了执政所需要的选票。说得明白点，在联邦政府中，马来人虽居多数，但和华人人口的差距，不是很大，假如让新加坡独立，少了新加坡一百五十万华人，相对

- 的,马来西亚领域中,马来人在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就大大提升了,当时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将李光耀踢出了联邦,他在联邦的执政权就高枕无忧了”,这都是很重要的当时知识分子的看法。不过作为南来文人,包括几次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碰面,他没有参与新加坡政治的讨论,足见其言行的谨慎小心。参见李孝定:《逝者如斯》,第109、129、130页。
- ②⑥苏雪林:《民国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十月卅日(星期六)》,《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第444页。
- ②⑦苏雪林:《民国五十四年(一九六五)九月十三日(星期一)》,《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第422—423页。
- ②⑧苏雪林:《民国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十月十七日(星期六)》,《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第271页。
- ②⑨苏雪林:《民国五十四年(一九六五)九月二日(星期四)》,《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第416—417页。
- ③⑩苏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第218页。
- ③⑪苏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第221页。这次交往中的“温先生”有可能是温汝良。温祥英言:“今天问了陈剑虹,问了麦秀以及叶蕾。叶蕾说当时还有位打金的温先生。那是我的世叔,温汝良,写旧诗词的。我们都年纪太轻,对讲座就没有印象。中学生可能来自槟城所有的华校,未必只是一间。(我是如此猜想。)”参见笔者2014年10月20日与温祥英的通信。而另外一位同时期出身槟城的学者李有成言:“一九六四年我在钟灵读书,但我没印象苏雪林和孟瑶到过钟灵演讲。除非他们演讲那天我不在学校,但不太可能。”他猜测这两场演讲可能是黄崖所办的文艺营,参加文艺营的多为文艺青年和中学生。参见笔者2014年10月16日与李有成的通信。
- ③⑫苏雪林:《民国五十四年(一九六五)一月五日(星期二)》,《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第309页。
- ③⑬连士升:《连序》,凌叔华:《凌叔华选集》,第1、3页,新加坡世界书局1960版,下同。
- ③⑭凌叔华:《后记》,《凌叔华选集》,第259页。
- ③⑮孟瑶曾言:“五十一年以后几年,我去了南洋,因为课业繁重,又适应新环境,创作较少,但由于教《小说》、《戏剧》,也趁空将所收集的资料,编著了《中国小说史》与《中国戏曲史》,其目的也不过为了教学方便,将讲义扩编成书而已,说不上有什么其他贡献。此二书先由文星书店出版,现改由《传记文学》继续出书。”参见孟瑶:《孟瑶自选集·自传》,第10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
- ③⑯笔者与1966届中文系毕业生辜美高2014年10月15日的通信。
- ③⑰俞大纲:《俞大纲先生序》,第1页,孟瑶:《中国戏曲史》,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版。
- ③⑱苏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第223页。
- ③⑲凌叔华:《自序》,第1页,《爱山庐梦影》,新加坡:世界书局1960年版。
- ④①《餐风饮露》本名“*...and the Rain my Drink*”,出版于1956年,共十三章。中文版为李星可所翻译,仅翻译了英文版的前六章,因此标注为“上册”。没有翻译完全或者出版全本的原因大体是其中对新马政治的描述,特别是对马共分子的同情式的描写不方便在当时刊行。参见我在本论文同一段落的引文。
- ④②Han Suyin, *...and the Rain my Drink*,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56, pp. 103-104. (译文由笔者翻译)
- ④③韩素音著,李星可译:《餐风饮露》(上册),第88页,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年版。
- ④④苏雪林:《民国五十三年(一九六四)一月一日(星期五)》,《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第307页。
- ④⑤苏雪林:《民国五十五年(一九六六)三月十八日(星期五)》,《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五册》,第38页。
- ④⑥苏雪林:《民国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八月廿八日(星期日)》,《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五册》,第113页。
- ④⑦苏雪林:《民国五十五年(一九六六)九月十二日(星期一)》,《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五册》,第122页。
- ④⑧根据我对这几位先生的采访,当时他们都可以选修中文系的课程。如陈瑞献说:“梁明广乃南大现语第一届,我对当时现语课程内容不详。我晚梁好几届,记得现语第一年(1964)还得修一科中文,故选中文系葛连祥老师之课,在课堂温习有关中国诗歌发展之一般历史常识,对创作无甚影响。此外,其他课文均为外文。至于中文系同学,因是本科,受教授之影响可谓必然。其他科系同学是否受中文系教授影响,则不得而知。”参见笔者与陈瑞献2014年10月24日的电子邮件。陈荣照也谈到“凌教授是有在南大开‘新文学研究’、‘新文学导读’两门课程”。参见笔者与陈荣照2014年10月23日的电子邮件。这些都可以看出南大中文系当时在传播中华文化上,颇有贡献。
- [作者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何吉贤